

淮上廖氏三兄弟



唯上人志

張性風



前 言

本书介绍的廖运周、廖运泽、廖运升“淮上廖氏三兄弟”，是在江淮大地很有声望的爱国将领，他们自幼聚居于淮河岸边的廖家湾（今属淮南市），在大革命中先后进入黄埔军校，毕业后进入军界。其中廖运周是一位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事地下工作达20年之久的共产党员。他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党积聚力量，提供重要情报，在淮海战役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毅然率领国民党军一一〇师在双堆集附近举行战场起义，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对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廖运泽、廖运升在大革命后辗转于国民党军旅之间，经常寻找参加革命的途径。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他们率领的暂编第一师改编为新一一〇师，意在由他们重建一一〇师，继续为反动派充当炮灰。但是，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廖运周的召唤下，不久即于浙江义乌举行了起义。他们三人各自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最后终于汇聚在五星红旗之下，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今天，本会编纂出版了《淮上廖氏三兄弟》这本书，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具体生动地记载了廖氏三兄弟追求进步、追求正义、追求真理的事迹和他们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和平统一祖国，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省委党校廖光凤同志在搜集和编纂史料方面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此谨致谢忱。限于水平，编辑中难免存有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0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	-------

我的回忆	廖运周 (31)
------	------------

附：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86)
-----------------	--------

毛主席、朱总司令给廖运周等的电报	(87)
------------------	--------

中原、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	(87)
---------------	--------

起义宣言	(88)
------	--------

跟随廖运周将军十三年	闵金锡 (89)
------------	------------

在我党领导下的一一〇师	徐 仁 (100)
-------------	-------------

我的戎马生涯	廖运泽 (105)
--------	-------------

廖运升传	廖光凤 (162)
------	-------------

我的回忆

廖运周

一、青少年时代

我于1903年出生在安徽凤台东乡廖家湾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家中兄弟姐妹六人，我居长。幼时，家庭生活的艰辛，使我养成了倔强的性格。

七、八岁时，我在本村读私塾，后来村子里兴办了小学，又转入本村小学读书。这时，正当辛亥革命前夕，家乡父老激越的革命热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后，我的族叔辈廖少斋、廖海粟等“八兄弟”，就纷纷奔赴安庆投考新军。他们起初参加了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等组织的“岳王会”，后又参加了孙中山所创建的同盟会。于是不断地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品，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各种报纸、歌曲等，秘密带回家乡，带到学校，给我们相互传阅。他们在安庆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大部分人回到家乡参加了张汇滔等在寿县、凤台一带组织的信义会（同盟会分支）和农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薛子祥、熊成基等著名革命志士也曾到我村活动。1911年廖梓英等从广州回到家乡，给家乡增添了更多的革命力量，一时间革命的风云在廖家湾的上空激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们经常给我们讲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道理，

讲“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故事，特别是讲到有位留学日本的同盟会员因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限制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而愤然投海自杀时，我们的心都为之震动了。同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后，我们村在信义会的领导下，由廖海粟、廖梓英、陈子美等发动组织淮上革命军，与袁子金、岳相如等所组织的淮上军相配合去攻打寿州城。那天晚上10点多钟，月明星稀，一两千扛着土枪、土炮，背着大刀，手持长矛，臂缠白布带，浩浩荡荡地向寿州城进发，那动人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当时，我跟着队伍跑前跑后，情绪激昂。当夜，淮上军兵不血刃占领寿州城，宣布光复。从此，“革命战友们！大家起来，向前进！”的革命军歌成了我们最爱唱的歌曲。淮上军的壮举极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想有一天，也能拿起枪杆子驰骋于沙场之上。但是，后来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派军阀倪嗣冲由河南进占安徽，对淮上起义军实行残酷镇压。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廖家湾村及周围的20多个村庄均被焚烧一空。他们挖了廖氏的祖坟，见男人就抓，起义军的亲属都被迫改名换姓，扶老携幼，逃往他乡。我和同族的兄弟们只能有时夜晚回村，扒一点烧焦了的粮食糊口。南北议和以后，我们才回到家乡，重整家园，但此时我家已无钱供我读书，我只好帮助家里做点农活。

倪嗣冲军队的残酷镇压，并没有吓倒革命人民，只能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在上海避难的长辈和亲戚们还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仍不断地给家乡送来进步报刊、书籍，家乡的人也不断去上海探亲，来来往往。因此，当时国内外的一些大事，在家乡都可以听到，影响很大。一次，凤台县县长刘沛来廖家湾附近的蒋郢子，调查处理王姓地主家童养媳被勒死一事。由于刘沛受贿，处理不公，在众怒之下，我与一群青年一拥而上，砸烂了县长的轿子。一时，“打县长”的消息传遍附近各村。地方民团声言要来抓人，我趁黑夜逃往外地，与廖多礼、廖多瀚、刘士华、

廖多元、廖运升等到了蚌埠，由当时蚌埠商会会长刘华轩介绍到怀远，进了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创办的含美中学。当时，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比较安全，北洋军阀不敢进来抓人，课余时间还可以做些零活，以补助生活。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纷纷响应。消息传到怀远后，含美中学师生为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立即致电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表示慰问和支持，并在校内组织了学生义勇团和青年会。青年会会长王席珍（王儒），副会长侯怀礼、朱文傅，我和钮玉书、吴云龙、吴云（羽仙）、吴霆等都是委员。全校大部分师生，高举“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等标语，浩浩荡荡地上街游行示威。在含美中学师生的影响下，教会办的启慧女中、培德女子学校等校学生都成立了爱国组织，各个商店也都贴上了“不卖仇货”、“不进仇货”的标语。我们还集中焚烧了日货。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0年，我们青年会、学生会又领导含美中学学生反对校长赖尔慈（美国人）的专制和奴化教育，组织全校学生罢课。事后，由于我是“闹风潮”的头头之一，被校方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李坦（安平）、吴云、吴霆、陶甄、沈家修、吴生觉、吴生悟、吴经伦、侯宝璇等十余人。同学们为了反对学校开除我们，举行罢课声援，与校方相持不下。为了不使同学们受到影响，我们被开除的同学先后主动离校。我到寿县吴山庙（现属长丰县）大拐子唐老先生家塾馆读了半年书，主要是学习语文、写作。教师路程，号白衡，是隐居的辛亥革命志士，文学很有造诣，我受他教益颇大。

五四运动，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吴山庙这个偏僻的小镇，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了实现强烈的求知愿望，我向亲友告借，筹措了一些费用，于1924年考入了山东齐鲁大学医科。这时正是国民党一大以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全国

革命迅速发展。我在齐鲁大学读书期间，担任安徽旅济（济南）同学会总干事，常与李子勋、刘占一等一起组织与领导校内外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运动，如组织声援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的集会、游行和罢课，组织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讲演，以安徽旅济同学会名义电呈欢迎孙中山北上等，因此遭到校方的打击，组织领导学生罢课的同学都被开除了。我虽得到同乡老师侯宝璋的帮助，没有被开除，但也被勒令退学，因走投无路就回到家乡，在廖家湾小学校任教。

我在济南学医未成，但却增长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所以一回到家乡，我就与一些进步教师组织了青年促进会，并创办了一个名叫《前进》的刊物，在学生与本村青年中开展读书看报活动。同时组织学生在本村及附近集镇宣传革命形势，鼓动农民抗捐抗税。为倡导民主办学，还在小学校门口放了一个纸糊的字纸篓，专门收集学生及学生家长提出的改进办学的意见。这些活动在当时对促进家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遭到了一些思想保守、胆小怕事的长辈们的非难，他们惧怕因此而给本村带来横祸。当时，廖梓英在河南省国民军二军第十五混成旅任团长，还有很多亲戚在该部担任营连长，廖润斋为旅部参谋。柏文蔚也在河南，任国民军军校校长。于是，我又与廖多瀚一道离开家乡跑到开封，找到柏文蔚，经他介绍，进了中州大学文科学习。在校学习仅半年，因为参加非基督教同盟会，到街上去游行示威，被校方勒令停课三天，并且不准走出校门。因此，我陷入彷徨苦闷之中，觉得北方形势暗淡，不由想到了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南方。那时，我的堂弟廖运泽及同乡孙一中（以惊、德清）由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工作，堂兄廖运升在军校第四期学习，他们经常给我来信，介绍了广东的革命形势和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二、从黄埔军校到南昌起义

投身军校

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我获悉后积极要求报考，得到柏文蔚的支持和鼓励。我持他的介绍信首先到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四马路皖春公寓（公寓主人是安徽人，共产党员。安徽早期进步人士来上海多数在此居住），遇到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李天真、吴梓丹同学，他们带我到黄埔军校设在上海大学的联络站，换了去广州的介绍信，领取了食旅费，又帮助我买了轮船票。我即乘轮船南下，于1926年3月到达广州。当时所有来广州报考军校的人都住在豪贤街公寓，等待分批应试。未考试前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即“三二〇”事件，由于陈独秀等人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使蒋介石反共篡权的阴谋部分得逞，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广州的形势因而紧张起来，茶馆酒楼里到处贴的都是“莫谈国事”的标语，一扫我初到时的革命气氛。周恩来同志将退出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政治训练班，驻在广州大佛寺，孙一中也在训练班学习。一次我到大佛寺去看望孙一中，因是初到广州，对当时形势不甚清楚，对革命的道理也认识模糊，便表示也想到训练班来学习。孙一中当即笑了笑，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当时国内南、北方的形势，以及国共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最后说：“这里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暂时都不带兵；要干革命还要有兵有枪杆子，你还是去考黄埔军校吧。”在他的启发和引导下，我参加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的考试，录取后编入了第二团第一营第一连，团长郭大荣，营长沈清震，连长陈锡鏊，驻燕塘沙河（黄花岗下面）。从此，开始了我的戎马生涯。

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与中州大学截然不同，特别是入伍生

团，主要是以学习军事为主，进团第三天即发了枪，打绑腿，穿草鞋，生活艰苦，操练紧张。但我是第一次拿枪，心中乐滋滋的，精神倍增。不久，学校派我们到黄埔岛放哨，警卫海上，检查来往的船只。夜晚隐蔽在甘蔗田里，蚊虫很多。一个多月以后，部队开往东江惠州剿匪。东江平叛以后，土匪很多，骚扰地方，社会秩序紊乱。我们驻惠州西北郊玄妙观，后又开往博罗县（惠州往广州途中的小县）维持地方秩序。9月间回到黄埔岛举行升学考试，我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

黄埔第五期总共有五个大队，下设有中队、区队。第一、二大队是步兵科；第三大队是炮科；第四大队是工兵科；第五大队为政治大队。我编在第三大队第九中队第一区队第一班，与许光达（德华）同桌，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是史文桂（合肥人），第九中队队长刘××（合肥人），第一区队正副队长是来世升和肖超武，第二区队正副队长是晏金雨（中共党员）、郭俊英（郭化若）。与我同队的学员有彭孟缉、周仲英、陈明英、吕国桢，以及朝鲜族人白珪、朴世昌等。

军校的革命气氛很浓。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均在军校担任工作，并为我们讲授政治课。学校还聘请了很多苏联顾问。中共在校内各中队建立了支部，许多学员都是各省共产党组织选送来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是军校中的骨干。由于共产党参加了领导，军校实行的是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我们带着武器，背着背包，徒步北上。经攸县、衡阳到长沙，然后乘车于12月到达武昌。沿途虽大部分是步行，跋山涉水，但并不觉得苦，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我们还组织了宣传队，边行军边宣传北伐的意义，与群众联欢，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所到之处，深受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到武昌后，我们又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宣传，革命激情很高。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1926年冬邓演达派陈惟中任招生委员，招收第六期入伍生。招收的男生编成两个大队，每大队分四个队，每队120人左右，住两湖书院；女学员300人，编为一个大队，住校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我们由广州来的五期学生，政治大队住两湖书院，工科和炮科住校外平湖门原北洋军炮兵营房。当时军校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起初蒋介石仍担任校长，张治中任教育长，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撤掉蒋介石校长职务，军校改为委员制，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常务委员。谭延闿名为常委，并未到任，实际工作由邓演达负责。教育长改为侯连瀛，政治部主任由施存统继任。这时廖运泽也由潮州分校来到武汉，任分校政治大队第四队队长，不久即调往叶挺的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任团附。廖运升在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北伐军总部警卫营。

1927年5月，驻湖北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去河南北伐，武汉后方只剩叶挺的两个团，兵力空虚之机，率部叛变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突然袭击。为了组织队伍讨伐叛军，保卫武汉，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为主，加上农讲所、学兵团等组编成立一个独立师，归叶挺指挥，由侯连瀛和杨树松分别任正副师长，军校炮兵队分别编入师属各团。部队于18日晚出发，当我们到达纸坊时，叛军已与我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我们立即投入了战斗。当时大家热情很高，但缺乏作战经验。激烈的战斗从夜间持续到次日下午，叛军被打败，狼狈逃窜，武汉转危为安。我们的队伍勇猛地向前追击逃敌，一直追到咸宁，双方都有伤亡。同年6月在沔阳我们又迎击进攻武汉国民政府的杨森部队，在石矶头的阵地上，渡过了1927年的端午节。这些战斗对我们军校学员来说，是很好的实际锻炼。我们在战斗中发扬了黄埔军校的传统作风，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巩固北伐后方，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征杨森结束，独立师回到武汉，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汪精卫逐渐暴露出假革命的面目，武汉国民政府迅速逆转。为了防止意外事变，我们军校学生全副武装，冒着盛暑，在武昌城外卓刀泉一带作野战演习。不久，武汉军校五期草草毕业。当时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还未公开叛变国民革命，我和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该军直属炮兵团。

加入共产党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早在齐鲁大学和中州大学时，同学中的刘占一、陈辑庆等就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从事革命活动从不回避我。进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后，与同学冷启英（江苏睢宁人，中共党员）、徐怀云（中共党员）比较接近，我们经常到时在广州的张曙时（江苏睢宁人，国民党左派，后加入共产党）家里去玩，张就给我讲一些中共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周恩来、邓演达等人的革命经历等。编入炮兵队后，我与中共党员许光达交往甚密。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活动都给了我很大影响，加之军校的政治教育，使我提高了思想觉悟，我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我曾向许光达流露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在广州到武昌的途中，我和靖任秋（大康）经常在一起进行宣传活动，彼此互相支持、互相帮助。靖任秋当时是校内黄埔同学会成员，又负责党的工作。到达武昌后，我再一次向靖任秋和孙一中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27年3月，在平湖门炮兵大队的食堂里，支部书记龙子仁通知我，由靖任秋、孙一中介绍我为中共党员，并主持了我的入党宣誓仪式。这是我政治生活的新起点，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从此，我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努力工作。

奔赴南昌

1927年7月，我随炮兵团移防九江。南昌起义前夕，我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时，遇到驻在此地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

五师七十五团团长沙孙一中，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要我留团工作，我欣然同意，即留下任该团参谋。七十五团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屡建功勋的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大部分官兵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召开所谓“分共”会议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严重恶化的形势，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接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挑起了组织与领导起义的重担。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当我到达马回岭时，全团正积极而又秘密的进行着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7月31日黄昏的时候，孙一中团长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要我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拂晓全团各营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接到这个通知后，很多营、连干部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

8月1日黎明，全团集合在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等待着下达进军的命令。孙一中团长以党代表的身份，向大家公开宣布了中共中央“在南昌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我们七十五团截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这列军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命令一下，队伍立即迅速散开，隐蔽在铁路两侧。不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缓驶进站来，还未完全停稳，只听号音一响，孙一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士兵，首先纵身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到处响起“下车缴枪”的喊声。车上的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火车。张发奎坐在最后面的车厢里，看到部队秩序突然大乱，知已不可收拾，急忙带三名警卫员跳车逃走。我们迅速抢登火车，向南昌进发。这时车厢里充满了欢快的笑声。火车行驶的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直到下

午近黄昏的时候才到达南昌火车站。这时，南昌起义的计划已胜利实现。周恩来、叶挺同志的代表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我们。听到起义胜利的消息，同志们群情振奋，下车后荷枪实弹列队，雄赳赳地开进了南昌城内。根据起义总指挥部的命令，我们与其他部队一样颈上系着红色领巾，驻守南门，担任警戒任务。次日午后，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代理团长廖运泽（团长许继慎西征时受伤，廖运泽副团长代理团长）来我团看望，并同我们一起去参观了起义时敌我双方的指挥部，还请我和孙一中等到百花洲吃了一顿西餐。回到驻地后，见到了刚从九江来的许光达。原来他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方面军炮兵营。在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反共时，军校学员均被秘密监视，许光达遵照党的指示，与炮兵营六七位同志一起，秘密离开张部到达南昌，被分配到七十五团，许任二营五连连长。从此，我们成为亲密战友，并肩走上新的革命征途。

“打回广州去”

南昌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敌人，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起来，围攻起义军。针对这种情况，起义部队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打回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去，以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在我们到达南昌的第二天，部队传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内容是进军广东的命令、计划及部队调整的意见，口号是“打回广州去，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指示，参加起义的部队整编为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我们七十五团属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建制，仍由孙一中任团长，团参谋长张启图，团附、政治指导员分别为陈三俊、杨心奋。我任团部参谋兼警卫连连长。连队重新进行了组合，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

8月3日，兄弟部队由南昌陆续出发，第二十五师担任后卫，我团又是全师的后卫，直到8月7日才最后离开南昌，临出发前，

上级布置要轻装，多带子弹，每人250发，实际上带了300发以上，有些同志为了多带子弹，把衣物等都丢弃了。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大批购粮用武汉纸币，购买少数粮、油、蔬菜等付给银元。连里的向导也是花钱雇的，每人每天一块银元。给我团挑文件用品兼带路的李××，送了我们三天，叫他回去他坚持不愿离开，说：“你们到哪里，我就送到哪里。”群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8月18日，贺龙的二十军抵壬田市，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次日击溃了敌军的阻截进入瑞金。我二十五师则到达瑞金西北地区集结待命。当时据悉钱大钧、黄绍竑的两个师已先我到达会昌，阻止我军南下。为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前委决定首先全力歼灭该敌，然后再返回瑞金集中。

强夺会昌

会昌城位于贡水上游，是个河套盆地。城西南是河，河南岸是一段高山悬崖；城西北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城北侧的大柏山，是控制城东北的制高点；城东南山岭起伏，山上布满了小松树林。8月22日，起义军指挥部命令第二十军进攻会昌城东南高地，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进攻城北大柏山，第二十五师迁回到会昌迤西，迎击由洛口增援之敌，相机夺取河南岸高山。我团因系后卫，直到次日上午8时许才赶到河边。这时二十四师已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一带高山，我师先头部队也开始向城西南河岸推进。孙一中叫我到军指挥所领受作战任务，我跑步到达指挥所，见到了叶挺总指挥。他身穿整齐的草绿色军装，背着两手，叉开两腿，站在一片稀疏的树林里，正在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看到我后，简要地向我讲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他指着城西南一带高地说：“二十五师的部队在那里，他们打得很激烈。敌人居高临下，凭险顽抗，七十四团在进攻中受阻，伤亡很大，进展缓慢。”他又指着河南高山命令我说：“你们七十五团要迅速过河投入战

斗，一定要把这一带高山拿下来。”临走时，他又叮嘱我：“部队要迅速渡河作战，一分钟也不能延迟！”我接到命令立即以最快速度跑回团部向孙一中报告。这时部队正在吃饭，孙一中果断下令说：“饭不要吃了，背包放在原地，立即投入战斗。”说完，他便带领战士轻装渡河，投入攻占高山的战斗。这座高山东、北两面河水环绕，不宜攀登；西面则有起伏相连的三个制高点，敌人配有强大的火力。不攻下这三个制高点，拿下这座大山，我们就无法攻占会昌。孙一中率领一营和二营作正面进攻，命令三营隐蔽迂回到山的东南侧，出敌不意，配合正面进攻的部队，俟机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后，一营很快消灭了第一个制高点上的敌人，敌兵力集中到第二个山顶上，利用工事疯狂向我反击，二营又从右翼绕到南侧，从背后打击敌人。敌腹背挨打，惊慌失措，纷纷向第三个山头逃窜。这时隐蔽在山南的三营，立即发起攻击，杀声连天，山鸣谷应，敌人弃尸遍野。我紧随孙一中团长身后，向敌人的最后一个制高点冲去。敌人疯狂反击，孙一中的警卫员覃光中负了重伤，手拿机枪喊着：“团长，快把手提机关枪拿去。”孙一中顾不上回头，对我命令说：“冠洲（我当时的名字），快把机枪拿过来跟我冲。”敌人的最后一个制高点很快被攻占了，我们拔下了敌人“潮梅警备司令部”的黄旗，插上了我军的红旗。山下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剩下的除被活捉50余名外，其余的都从岩顶跳进了水深流湍的河中；一沉一浮，象一群落水鸭漂满江面。

孙一中对情况判断之正确，决心下达之快，行动之敏捷，的确使我感到敬佩。当时他很年轻，约20岁，圆圆的脸上有着两个酒窝，经常挂着笑容，平时很腼腆，打起仗来却勇猛异常。早闻北伐他在独立团一营时，在进攻武昌的战斗中营长曹渊牺牲了，由他代理营长，他亲率士兵用云梯爬城，一举成功。事后，周恩来同志曾赞扬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我团占领了这个制高点，摧毁了敌人火力的枢纽，使我七十